

A portrait of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showing him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red coat with a white collar and a dark cravat. He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 and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探求天才的奧秘

Mozart
莫札特

社會學大師探討一位天才的發展過程

里亞斯 (Norbert Elias) ◎著 呂愛華◎譯 林端◎導讀

現代名著譯叢

莫札特

——探求天才的奧秘

Mozart

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著

呂愛華◎譯

林 端◎導讀

現代名著譯叢

莫札特：探求天才的奧秘

2005年5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6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Norbert Elias
譯者	呂愛華
導讀	林端爵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叢書主編	簡美玉
特約編輯	鄭家麟
封面設計	胡筱薇

電話：(02) 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 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 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 22312023

高雄門市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

電話：(07) 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854-4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信箱 e-mail: linking@udngroup.com

Copyright © 1991 by Norbert Elias Stichting
MOZART
Edited by Michael Schröter.

新學
社
PDG

莫札特：探求天才的奧秘 / Norbert Elias 著 .

呂愛華譯．--初版．--臺北市：聯經

2005 年(民 94)，256 面

14.8×21 公分．(現代名著譯叢)

譯自：Mozart：Zur Soziologie eines Genies

ISBN 957-08-2854-4(平裝)

1. 莫札特(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傳記

2. 音樂家-奧地利-傳記

910.99441

94006492



導 讀

伊里亞斯和他的莫札特

林 端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一、伊里亞斯其人其事

當社會學家碰到音樂家，會碰撞出什麼火花呢？當猶太裔的社會學家傾聽日耳曼音樂家的音樂，會是什麼光景？

且來看看這本社會學大師寫音樂大師的奇書：長壽卻飽受流離之苦的伊里亞斯(Nobert Elias, 1897-1990)，用社會學來研究短壽卻享盡身後盛名的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廣義來講，這是一本有關音樂家、有關天才的研究，是音樂社會學與文化社會學的重要作品。在這部作品中，他首尾一貫地強調，天才並非如大家所想像是與生俱來的，相反地，天

才必須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才能成其為天才。換句話說，沒有庸才，哪來天才？沒有聽眾，哪來音樂家？沒有支撐音樂家的文化背景與社會關係，天才就無法成就其鶴立雞群般的卓越成就。這是他形態社會學(Figurationssoziologie)與社會學關係主義(sociological relationalism)研究方法的具體運用，終其一生，他把這樣的研究方法應用在各個不同的社會文化領域，由莫札特到德國人、猶太人，從族群關係到中世紀的刀叉與餐廳禮節的問題。縱橫上下論古今，他首尾一貫地進行相當令人佩服的研究工作。我們在此首先要進行的，是就其個人的生命史與學術創作史作一簡單回顧，然後看看這位大器晚成的社會學大師，是在什麼樣的艱苦環境中，一步一步地完成他終身研究的偉大志業。

伊里亞斯，1897年6月22日生於德語區的布雷斯勞(Breslau)¹，這在當時隸屬於德國境內，現在則隸屬於波蘭(當地猶太人之多，僅次於柏林與法蘭克福)。他的父母都是猶太人，家道殷實，身為猶太商人家庭的獨子，從小過著不愁吃穿的生活，接受普魯士高度人文教育的素養。他在舒適的家庭中長大，經過私人教師啟蒙之後，就讀於家鄉著名的約翰尼斯文法中學(Johannes-Gymnasium)，在此培養了他的人文素養，優秀

1 有關他的生平，主要參見德國社會學家 Hermann Korte 的傳記《伊里亞斯：人的科學家的形成》(Über Norbert Elias: Das Werden eines Menschenwissenschaftlers, Frankfurt/M.: Suhrkamp, 1988)以及他的自傳——《談談自己》(Über sich Selbst, Frankfurt/M.: Suhrkamp, 1990)。

的師資讓他對於學術研究，尤其是康德以下的哲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在那個時代裡，猶太人非常注意孩子的教育，以為其未來出路作準備。他的父親當年由於經濟的因素，無緣就讀大學，便把希望都寄託在他身上，冀望他攻讀醫學。

德語世界裡的猶太人比法語世界的猶太人，處境較為不利。19世紀的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終其一生，無法在德國大學謀到任何教職，除了因為他屬於左派之外，另一個原因便是其猶太人的身分。當時在出任政府公職與某些視同官方的職位(如教授)裡，猶太人皆受一定的限制。所以伊里亞斯的父母，儘管已相當認同普魯士文化，但還是很希望孩子能受很好的大學訓練，擁有一技之長，以便在一個猶太人被另眼相看的環境中生存下去。伊里亞斯除了本身喜歡哲學之外，也奉父母之命選擇醫學作為大學主修的科目，在那個時代裡，成為醫生的確確是猶太人極佳的出路之一，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在進入大學之前，由於1914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年1915年，伊里亞斯才18歲，就被派到西線的戰場去當兵，幸好並未戰死沙場。1918年21歲，他進入家鄉的布雷斯勞大學就讀，醫學的訓練使他獲得一定程度的自然科學知識，而哲學才是他充滿興趣的學科。然而介於哲學觀念論的人性圖像，以及醫學解剖生理學的人性圖像之間，令他產生非常大的困惑，究竟人是一個擁有理性思惟能力的「觀念人」？抑或是與動物並無太大差別的「生物人」？

德國的大學相當自由，所以他有一兩個學期跑到德國西南方的海德堡大學與佛來堡大學遊學。雖然在哲學與醫學之間，他最終選擇了哲學，但當時新康德主義(Neukantianismus)籠罩下的哲學系，其對人性的看法，以及對人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卻沒有辦法滿足他個人的想法與觀點。

自然科學對於人文學科的挑戰，就好像在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身上發生的一樣，韋伯解決的策略就是建立自己的理解社會學(verstehende Soziologie)，將人文學科的理解(Verstehen)研究方法，與自然科學的解釋(Erklären)研究方法綜合起來，希望同時涵蓋內在主觀的意義與外在客觀的經驗事實。這種社會學的研究策略對伊里亞斯產生莫大的吸引力，也導致他後來放棄醫學與哲學，轉而投奔社會學的學術抉擇。

為了取得博士學位，伊里亞斯在家鄉大學的哲學系裡，找到一位新康德主義的老師賀尼斯瓦(Richard Höningwald, 1875-1947)，由於他本身已走向經驗主義，而對哲學形上學的立場保持一定的距離，導致他與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間的關係異常緊張，他按己意寫出來的博士論文(題目為「理念與個體」)，在指導教授眼裡始終是不及格的作品，送上去、退回來、改了又改，最後終於在1924年拿到了哲學的博士學位。當時正值一次戰後的威瑪時代，畢業後，他的父母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希望他逐步自立，於是他在企業裡當了兩年的行銷主任。

然而對於學術的熱情，仍驅使他回到大學。1925年，他轉到海德堡大學繼續未竟的學術生涯。由於他放棄了哲學家的先

驗立場而選擇經驗科學家的立場，在博士論文階段就與指導教授鬧得很不愉快，這注定了沒希望進行所謂的教授論文(Habilitation)。因為想要在德語區擔任大學教授，除了要擁有博士學位之外，還得撰寫第二個博士論文，即所謂教授論文。而他對人性以及對人文社會學科的看法，已然轉向接近經驗世界的學科觀點，因此他轉到海德堡，希望在那兒找到能接受他的論文指導教授，一方面師從學習，二方面也希望能謀個助教之職，讓自己的生活有所依靠。

伊里亞斯於 1924-25 年到達海德堡時，韋伯已經去世(逝於 1920 年)，但韋伯留下來的傳統卻讓海德堡擁有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學學圈，韋伯的遺孀依然健在，繼續主持其家中非正式的學術討論會。韋伯的弟弟愛佛瑞·韋伯(Alfred Weber, 1868-1958)主導著海德堡大學裡社會學的研究工作，當時並沒有社會學系，基本上還是在「國民經濟學系」(迄今海德堡大學經濟系為了紀念他，仍以他為系名)裡作社會學研究。另一位重要的社會學大師，則是創立知識社會學的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當時曼海姆尚非教授，但卻是已取得教授資格、待價而沽的私人講師身分(Privatdozent，此身分並非真正無給職的私人講師，而是已取得教授資格，等待受聘的教授候選人)。在這個富有學術傳統的學術社群裡，伊里亞斯非常幸運地獲得良好的社會學訓練，在愛佛瑞·韋伯教授與曼海姆私人講師這兩位大師之間，伊里亞斯選擇了——或者說是獲得了曼海姆的青睞；在愛佛瑞·韋伯那邊，伊里亞斯只是第四順位，而前面已

有三個人等著作教授論文，然而曼海姆卻以他為第一順位，答應當他的指導教授，只要他擔任三年的助理。

曼海姆於 1929 年底才因其傑作《意識形態與烏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a*)，獲得法蘭克福大學的任命，出任社會學正教授，所以伊里亞斯認為跟定這個年輕的指導教授，未來的學術生涯應該也可循序漸進、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海德堡的四、五年期間，一直到 1929 年底，他同時為愛佛瑞·韋伯與曼海姆所接納，他同時獲得韋伯遺孀的邀請，到韋伯家中參與學術討論。在這個學術氛圍中，伊里亞斯確立了自己作為社會學研究者的人生志向。他受到兩位大師的庇蔭，而這是擁有強大的韋伯傳統作為基礎的，因為人們都說愛佛瑞·韋伯教授處在他偉大的哥哥的陰影之下。

1930 年，當曼海姆到法蘭克福任教時，伊里亞斯也到法蘭克福大學擔任曼海姆的研究助理。著名的法蘭克福學派也剛萌芽，同為猶太後裔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與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等開創了「社會研究所」，但卻從不與曼海姆往來。然而伊里亞斯夾在其中，卻受雙邊垂顧，就像不久前在海德堡一樣。他在法蘭克福大學，一面作助教，一面進行教授論文的準備工作，論文題目是「宮廷人」(*Der höfische Mensch*)²。眼看著教授生涯在望，但好景不常，三年

2 該書後來改名為《宮廷社會》(*Die höfische Gesellschaft*, Neuwied: Luchterhand, 1969 年初版)。

後的 1933 年，納粹崛起，大難來時各自飛，曼海姆自身難保，一方面他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猶太人，另一方面他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左派，這兩種身分當然都是納粹最討厭的，所以曼海姆不得已必須步上流亡之途。他像一棵年輕的大樹，這棵樹在德國本土被拔除後，伊里亞斯等徒子徒孫們頓失學術與生活的倚靠（同樣的，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等人也流亡他國）。1933 年，伊里亞斯逃離德國，就像他自己經常掛在嘴上講的：「教授論文沒做完，再念書太老，但去求職當教授，又顯得太年輕。」結果，他在瑞士及法國求職的過程中四處碰壁；1935 年後他又流亡到英國。其實最悲慘的，還不僅是學術生涯與職業前途被納粹所徹底粉碎，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最敬愛的兩位親人。當他逃到倫敦時，其實雙親也曾在 1938 年逃到當地與他相會，然而兩老卻完全放心不下家鄉的產業，心想納粹再怎麼壞，也不至於真正壞到在對付德國本土的猶太人之後，還去對付波蘭地區德語世界的猶太人，於是兩老便天真地回到家鄉，最後先後於 1940-41 年間死在納粹的集中營裡。

那是一個歐洲猶太人無所遁逃於天地間的時代，他在法國找不到出路，於是轉往英國發展。一句英語都不會的他必須重新開始，為了學術與職業前途而苦練英文。在倫敦，曼海姆再也幫不上他的忙了，他雖比伊里亞斯較早逃到英國，但卻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好鬥成性的曼海姆在英國的社會學界裡自我奮戰，最後卻在教育系而不是社會系裡找到正教授的職位，因此他對伊里亞斯也就沒有再提供任何實質的幫助。事實

上在英國求生存，也不需要教授論文，只要有一定的學術研究能力，同時有大學肯聘任，便可在學院裡工作。然而可想而知，在那個戰亂的年代裡，一切百廢待舉，擁有人文社會學科專長者滿街都是，而大學職位卻是少得可憐，為了生存，伊里亞斯只得前往類似社區大學及訓練中心等地方去謀職。

他到工黨附設的成人教育中心任教，教授一些社會學課程，然後孜孜不倦地撰寫一本又一本的重要著作。1954 年，他才受到萊斯特(Leicester)大學社會學系聘任為講師，這時他已經 57 歲了(某些他教過的學生早已名列教授之位)。隨著其作品逐漸受重視，他變得小有名氣。1962 年，也就是他 65 歲時，終於獲得教授的聘書，但卻不是在歐洲，而是非洲的迦納大學給他兩年的教授聘書。1964 年，他自迦納返回歐洲，67 歲的他甫回歐洲大陸，家鄉已不再是德國，而是荷蘭。在荷蘭有許多欣賞他的學者，他受邀擔任客座教授，最後德語世界也注意到他了，因此最後得以回到德國，在各大學中擔任客座教授。1977 年，他以 80 歲高齡，獲得法蘭克福頒贈傑出的學術研究獎——阿多諾(Adorno)獎(此獎座之設立乃為紀念前面提到的傑出猶太裔社會學家兼音樂家阿多諾)，這是為表揚有重大學術貢獻的學者所頒贈的獎勵。一個當年被驅逐出德語區的猶太人，終於重回德國，受到積極的肯定，然而德國畢竟是傷心地，所以 1984 年(87 歲)，他選擇了永久定居於阿姆斯特丹；1990 年，他以 93 歲的高齡去世。

伊里亞斯是怎麼樣的人呢？他是猶太人？德國人？英國

人？還是荷蘭人？在他成名之後，年輕的德國社會學家訪問他：「你一生經歷過這麼坎坷多變的生涯，到底還會不會自認為德國人呢？」顯然，這些德國的學術後進滿心期待伊里亞斯會自認為是德國社會學家，因為他的主要作品皆以德文寫成，何況又直接師承韋伯兄弟與曼海姆的學術研究傳統。但是長久身為邊緣人(marginal man)的伊里亞斯回答得簡潔有力，他說雖然他深受德國文化影響，但他是「在英國生活三十年的德國猶太人」。其實，他是一位類似世界公民的人，這是他的身分，也是他的角色，他不專門隸屬於哪個國家。一生的坎坷並未將他擊倒，他著作等身，而且面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帶著一定程度的樂觀，令人不得不佩服其執著於學術研究的毅力與決心，還有那旺盛且持續不斷的求生能力。不管多艱苦的環境，多寂寞而孤單的生活方式，都沒有擊倒他。他還是站了起來，而且以驚人的毅力與決心跨越了兩次世界大戰，橫跨古典到當代的社會學思潮，最後卓然成家，自創一派。至今在荷蘭、英國與德國等地，都有伊里亞斯學派的徒子徒孫在那裡持續努力地進行學術研究。

坎坷多變的一生，造就了伊里亞斯的大師風範，以其社會學大師的身分來描繪 18 世紀西方的音樂天才——莫札特的一生，大師書寫大師，精彩自是可期。以下我會先介紹伊里亞斯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及其重要的作品，接著再談談莫札特這本書的主要內容，然後再將本書放在伊里亞斯的學術創作脈絡中，探討其與作者本人，以及其與其他作品之間密切相關的特性。

討論完這些，我們將會發現，這部作品絕非一部孤立的作品。相反地，伊里亞斯在這本書中，首尾一貫地展現其社會學研究的特色，而本書則與他的其他作品，既密切相關又相互輝映。

二、伊里亞斯的社會學理論

要理解伊里亞斯的社會學理論³，必須先談談他的某些關鍵概念，首先是「形態」(Figuration)的概念，這是他自己獨創的概念，透過這個概念，他整合了微觀社會學與宏觀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亦即整合了「行動論」與「結構論」不同的研究方法。韋伯強調社會學的基本研究對象是人的「社會行動」(soziales Handeln)，也就是所謂一切社會學的分析，都必須從個人的行動主觀、客觀的意義出發，亦即從微觀的社會學立場來進行社會學分析。對於這樣的傳統，曾經身受海德堡大學韋伯學術傳統薰陶的他，自是耳熟能詳。同樣的，法國猶太裔的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則從宏觀社會學出發，強調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獨立於個人而存在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社會制度與結構都必須從這些宏觀的視角來加以掌握。此一兩極化的社會學分析方式，要嘛是個人行動，要嘛是社會結構，再不然是微觀世界，或者是宏觀世界，對伊里亞斯來說，

3 有關其社會學理論，主要參照他的《什麼是社會學？》(Was ist Soziologie? München: Juventa, 1970)；以及他為 Bernhard Schäfer 主編的《社會學基本概念》(Grundbegriffe der Soziologie, Opladen: Leske & Budrich, 1995)所撰寫的三個概念：形態、社會進程與文明。

如何克服、化消這種方法論上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是他本身社會學理論，以及社會學研究方法所要展現的特色。在這種前提下，他建構了「形態」這個概念。

他強調一個人基本上作為一個社會性的存在 (social being)，是沒辦法靠生物的本能來過日子的，因此，必須在一個社會脈絡中，在跟別人的共同相處與生存的狀況下成長。換言之，人是一個社會性的存在，在人的群體裡，人所建構的象徵世界裡，彼此之間擁有共通的語言、共通的象徵、共通的知識與生活方式。在這種狀況下，人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所以人是存活在與別人相互倚賴的「形態」裡，在那裡成長為一個人，一方面社會化，一方面個體化；我們跟別人在一起，一方面成為社會裡面的一分子，二方面也因為別人的襯托而使本身的個體性呈現出來。

所以，共同生活、相互倚賴，既相同又相異，這些是同時發生的事實，人的群體性不可能脫離個體性而存在，人的個體性也不可能脫離群體性而存在；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並不是一個相互獨立的概念，相反地，它們是並存共生的概念。個人也是跟其他的人在特定的「形態」裡成長的，沒有他人就沒有自我，就好像人稱代名詞裡，「我」的代名詞預設著「你」跟「他」的存在，「我們」也是預設著「你們」跟「他們」的存在，「男性」預設著「女性」的存在，或者社會角色裡，「丈夫」的角色預設著「妻子」的存在，「父母」的角色預設著「子女」角色的存在，所有這些不只在概念上相輔相成，而且在實

際的社會生活中，也是生活在不同的「形態」當中。

「形態社會學」所要強調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倚賴，它所強調的既非微觀社會學的社會行動論，或者是宏觀社會學的社會結構論，前者我們常稱為「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後者則常被稱為「方法論的集體主義」(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而伊里亞斯為了突破這種二元對立，則強調一種「方法論的關係主義」(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意思是說：人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存在，我們不能過度強調其個體性，也不能過度強調其群體性或社會性，因為人的群體性與個體性都在人的關係性中得以確保，「我們」是跟「你們」、「他們」在一起的，正如「自我」與「他人」息息相關。不僅在概念的世界裡，各種代名詞與概念構成一種「形態」的關係，其所對應的社會生活中之所有人際關係，都構成不同層次的形態關係：「方法論的關係主義」所要研究的就是人相互倚賴的形態，既非偏重獨立的個人，也非偏重一個過度壓抑個人的社會；相反的，人生活在各種社會形態中，一方面被社會影響與制約，二方面則在各種形態的關係脈絡中，在與別人相互倚賴的各種形態中發展自我。

一言以蔽之，伊里亞斯的社會學研究就是社會中各種不同「形態」的研究，這本討論莫札特音樂天才的小書，在研究方法上也不例外。他是把「形態社會學」與「方法論的關係主義」應用在音樂天才跟他的家人、其所處的薩爾斯堡與維也納的宮廷社會，甚至歐洲的宮廷社會之間的「形態」關係。沒有庸才，

哪來天才？沒有聽眾，哪來音樂家？音樂家跟他所處的家庭、社會等不同類型的「形態」息息相關，縱然「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是一個音樂天才的極致表現，但若沒有足夠的社會關係支撐，沒有穩定的形態的結構支持，一代天才也難逃英年早逝、鬱鬱以終的命運。換句話說，音樂的卓越性或者天才的超凡特性，正因為有凡間庸庸碌碌的聽眾支持，才可能成其神聖性與卓越性；一旦有一天，他的聽眾不再支持他的時候，他走過頭，走到人家聽不懂的境界裡，也就是悲劇性的開始。

就這一點，伊里亞斯反對如韋伯的卡理斯瑪(Charisma)概念所體現的個體性能力，因為他認為韋伯強調的是個體性的、與生俱來的神秘力量，不管別人承不承認，這種力量是天賦的神奇力量；伊里亞斯反對這種概念，認為沒有群體的關係脈絡的支撐，此一概念毫無意義。1964年，伊里亞斯重返德國，在海德堡出席紀念韋伯百年誕辰的社會學大會裡，就曾發表論文，對此種過度個體化的概念提出批判⁴。所以在本書裡，他就是把形態社會學與「方法論的關係主義」應用到音樂家社會學、藝術社會學與天才社會學的分析之上。

其次，我們要注意伊里亞斯對「文明」與「社會進程」的重視。換句話說，社會學家不應該把前面談到的形態與關係主

4 有關他對韋伯卡理斯瑪概念的批評，參見本書譯者對本書德文原作所寫的中文書評，刊於《社會理論學報》第2卷第1期，頁211-220。